

後冷戰時期世界局勢的變化

蔡 瑋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緒 言

本文是兩篇相互連貫文章中的第一篇，本文將先行說明後冷戰時期世界局勢變化的原因，然後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將再進一步介紹由於這次世界局勢的巨變所造成的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究竟所指為何？有什麼特色？對未來的世界可能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自一九八九年以來，整個世界的局勢已經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只是在規模上相當的龐大，其影響範圍也相當的深遠，可能對未來國際政局的穩定與否、世界局勢的走向都會發生關鍵性的作用。難怪美國總統布希一再表明，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形成之中（a new world coming into view），美國有意趁此機會，為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努力。①

布希的看法可能是對當前世局的發展帶有某種期望，也可能包含一些遠見，希望在冷戰結束、共產主義正在逐漸崩潰的時候，透過美國的道德說服、實力展示，經過國際上權力的重新分配、組合，以國際合作的方式，使未來的世界更能免於戰爭的威脅，各國更能擺脫軍事競賽，而致力於經濟發展，使人類生活在一個更理性、更祥和的新世界秩序之中。

但是，坦白的說，這個理想是否能夠實現仍是一個未知數。危機固然也是轉機，冷戰的結束、共產主義的逐漸瓦解雖然解決了許多既存的問題，但是更多新的問題和困難也必然將接踵而來。比如說：東、西德的統一會為歐洲的政治均勢、經濟整合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垮台是否會破壞了長久以來的東、西方戰略平衡？蘇聯帝國的分崩離析，使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權，這對將來的世局有什麼樣的含義？東歐共產國家的民族分裂是否會影響區域性的和平安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華沙公約組織又將何去何從？這些都是新衍生出來的問題。

註① Time Neusmagazine, (Asian edition), April 1, 1991, No. 13, p. 19.

這些新的問題如果未經事前詳細的規劃、適度的引導，新世界秩序下的新世界局勢是否能為大多數的人類帶來最多數的幸福，這顯然仍然是個疑問。眼前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當前世界局勢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吾人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重大的因素才會促成世界局勢在短短的數年之內發生這麼大程度的變化？究竟是人的因素？事的影響？或是另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因為唯有在對世界局勢變化的原因有了解之後，我們才能進一步分析新世界局勢下的新世界秩序究竟是有什麼樣的意涵和特質？代表了那些特殊的意義？

本文的目的就在於討論後冷戰時期世界局勢的變化，作者將嘗試由不同的角度來說明近年來世界局勢變化的重要原因，指出這些變化導致世界新秩序的出現，然後在「續論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新秩序」第二篇文章中再進一步的分析、介紹其他的相關問題，希望能適度的歸納出一些具體的看法。

貳、世界局勢的變化

這裏所說的世局變化主要是指一九八九年以後的重大變化而言，這其中包括有：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的拆除；一九九〇年東、西德的統一；東歐共產黨國家自一九八九年底開始發生的巨大變化，如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捷克、波蘭這些國家紛紛棄絕共產主義，改採自由化、民主化的政、經制度，其中有些國家，如南斯拉夫還面臨了內部的種族分裂問題；一九八九年以後蘇聯大幅度的政、經改革，蘇聯高階層戈巴契夫和葉爾辛的權力鬥爭；蘇聯帝國勢力開始衰退，境內加盟共和國有意另起爐竈、尋求獨立；冷戰結束，歐洲勢力開始興起。

另外，一九九一年初，發生了難得一見（就規模而言）的波斯灣衝突，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多國部隊為了科威特的主權及石油問題，和伊拉克兵戎相見；八月間蘇聯發生了舉世震驚的流產政變，其戲劇性的轉折、起伏，當時確實為世人關切的重點。其次，在亞洲地區，外蒙古也逐漸擺脫共產主義的傳統束縛，開始試行議會政治；南、北韓於今年同時宣佈加入聯合國；柬埔寨問題已透過國際會議簽訂和平協定；中共雖然表示將堅持其門戶開放及改革政策，但是在政治上仍未放鬆其共黨極權統治；台灣則在本身的民主改革過程中，備嘗艱辛；香港儘管在一九九七年大限的陰影之下，也在今年開始進一步試行代議式的民主政治。

這一切的變化都說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國際局勢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確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已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只不過其中有些變化影響的層面可能較小，是屬於區域性的，有些變化的影響層面較大，是全球性的，除了立即性的影響之外，還可能有擴散的效應。無論如何，這一連串的變化，其變化之大，變化之快，實在讓人無法不對其加以注

意。

對於稍微受過歷史、國際關係、及政治學訓練的人而言，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可能正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發展的另一個關鍵性變化的時刻，其影響可能及於一個世代（generation，三十年）以上。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民族國家逐漸興起，二次世界大戰則正式結束了殖民帝國主義一樣，眼前世局的變化明顯的結束了冷戰以來的東、西方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人類（尤其是歐洲地區，及蘇聯）再以集體的力量，把歷史的發展推向另一個階段。

但是遺憾的是，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政治人物、各國領袖、學者、專家、或那些所謂的政治分析家、觀察家都未能合理的預見這場世紀性變局的到來。分析（或預測）未來局勢的可能發展方向，已經成了一項非常具有危險性、風險程度頗高的工作。②往往今日的分析明日就已過時，事態發展的程度和速度，往往超過了大家所預期的範圍，在很多的情況之下，大家只能跟在事態的發展之後，嚐試找出一個合理的解釋，說明事態為什麼會這樣變化，而不是那樣轉變。在更多的情況下，如波斯灣戰爭是否開打、可能程度大小、時間長短；蘇聯政變是否成功、戈巴契夫命運如何，這些問題上，我們發現分析的結果往往和實際的情形有相當的出入，更不要說是完全錯誤的了，許多的國內、外學者都曾有過這種尷尬、而且值得檢討的經驗。

叁、世局變化的重要原因

有關世界局勢變化的原因其中可能涉及的因素很多，我們可以用宏觀(macro)的方式來加以分析，也可以用微觀(micro)的方法來予以說明。用微觀的方法來看，每個國家、地區的變化都自有其本身的歷史性、政治性、或經濟性，甚至宗（種）族性的原因，每一件事情的變化其實都可以用史學的方法歸納出遠因、近因、及導火線。比如說南斯拉夫的局勢變化顯然就和波蘭或羅馬尼亞不同，蘇聯的改革和中共的改革比較起來，自然也有其獨特的原因和背景，不僅是不能，也不應該將彼此相提並論，等量齊觀。

但是，由於本文所要嘗試說明的是當前世局變化的重要原因，作者顯然無法就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變化進行細部性的仔細分析，說明各該國、或某一特定事件發生的具體原因。我們必須採取宏觀的方式，排除掉一些枝節性的敘述，畢竟，雖

註②

今年八月，當蘇聯發生政變之際，國內正在召開一項「中華民國與國際新秩序」的研討會，許多國外著名學者均曾參加此一研討會，多數學者均承認對於蘇聯政變的突然發生，驟然結束，其間的轉折起伏感到驚訝，美國學者施樂伯（Robert Scalapino）在另一場會亦明白表示，對於未來情勢的任何預測都是不明智，而且可能發生錯誤。請參見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八月二十九日，頁十一。

然每個國家、地區的變化各有其特殊性，但就整體看來又應該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舉例說來，東歐共黨國家的改革，和亞洲共黨國家的變化當然有其相異之處，但是就整體而言，這些變化都是整個世界潮流趨向於非共化、民主化的一部份，這些變化可以說都是整個國際大環境轉變、冷戰結束後的產物，因此本文將只能試圖以宏觀的方式，來說明當前世界局勢變化的主要原因。

世局變化已經是個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對於這麼大的一個事件，許多的學者由不同的角度來解析這個事實。有些人認為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有人則以為這是美國及蘇聯勢力過份膨脹（*oustretch*）的必然結果。另外也有人從經濟、或內政的角度來解釋世局變化的原因，還有一些人則認為這可能是科學、技術的成長、或第二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結果，甚至也有學者以為這次世局變化可能只是時機成熟、水到渠成的自然結果（*The Geist whose Zeit has come*）。究竟那種解釋較為合理，或是所有的看法都各有所本，我們下面將進一步的加以說明，不過歸根究柢的探究起來，這一切變化其實不超過人、事、時等幾個因素，除了這些因素的個別性影響之外，它們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可能也扮演了相當程度的份量。

1、人的因素

首先，就人的因素而言，領袖人物在人類歷史發展上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可以說是不勝枚舉，早期西方政治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以及盧梭（*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主權在民、三權分立、和全意志、民約論的思想影響了西方的政治思潮，以及後來政治制度的發展方向。^③近代的馬克思、列寧使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形態成了一股全球性的政治力量。希特勒的野心引發了二次世界大戰；史大林造成了東、西方冷戰；蔣介石先生引導中國堅持對日抗戰，拒絕妥協；毛澤東則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主導了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這些個人影響，甚或主導歷史發展方向的例子其實還可繼續的排列下去。

當然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意見，認為傳統的歷史分析過份偏重了政治人物或社會精英份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人類的歷史絕非一部帝王將相史，世局的變化亦非少數精英人物所能完全掌握和影響。相反地，廣大的群眾才是扭轉世界局勢的真正力量，群眾的力量如果經過適當的啟發、引導，自然可以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龐大力量，這種力量一經組合、發動，沒有任何的事、物可以阻擋。數年前菲律賓的人民革命推翻馬可仕，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間羅馬尼亞人民群起打倒西奧塞古，

註③

請參閱陳水逢著，*西洋政治思想史*（一）*契約論與美法革命時代政治思想*，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七十年，頁一一四一—一二四。

今年八月蘇聯保守派政變失敗，這些都是群眾團結，發揮影響力的典型例子。共產黨徒尤其信服此一論點，毛澤東當年就曾親口表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原動力，群眾是萬能的，能夠創造出道路來，中共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如同水和魚的關係，中共必須依靠群眾，而且要善於運用群眾。^④

或許這些歷史性人物或群眾力量，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但我們也認為事情應該並非如此的單純，若無其他相關因素、環境的配合，這些政治人物或群眾力量，是否能夠獨立影響世界局勢的走向仍是個令人疑惑的問題。因此，單純的由人的因素來分析世局變化的原因可能稍嫌失之草率，前述二種論點固然各有所本，也都可以找出歷史上的證據，但是由理論上看，任何一件事情的變化——尤其是錯綜複雜的世局變化——應該都是各種主、客觀因素，時、空環境，交互影響的結果，沒有一個單純的原因或理論，可以解釋所有的現象。

即或有此認識，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就一九八九年以後世界局勢的變化而言，蘇聯領袖戈巴契夫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而且是關鍵性的角色，這個看法基本上是為學術界所接受的。^⑤

一九八五年時，蘇聯領袖契爾年科（Konstantian Chernenko）在接掌蘇共總書記一職不久之後即告病逝，如果當時繼任的人選是保守派的巨擘李加契夫（Yegor Ligachev），而非戈巴契夫，蘇聯是否會推動開放（glasnost），及重建（perestroika）政策就已相當值得懷疑。如果沒有蘇聯的改革、開放政策、沒有戈巴契夫所推動的新思維，我們實在很難想像東歐局勢會在短短的幾年之內，發生這種戲劇性、根本性的變化。

同樣地，如果不是因為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蘇聯是否會放棄其對外積極干預的一貫作法，與美國合作，協議裁減核子武器；開始自阿富汗撤軍；減少對古巴、越南的政、經支援；同意東、西德統一；任令東歐集團就這麼土崩瓦解，讓共產主義幾乎成了明日黃花；使蘇聯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就陷入當前這種政治紛亂、經濟困窘的境地，喪失了超級強權的地位；這些都頗值得懷疑。這一切都凸顯出一個事實：戈巴契夫確實是這次世界變局中的一個關鍵性人物，沒有他的消極性的默許、容忍、以及積極性的改革、合作，這次世界變局中的許多變化都不可能驟然的發生，其範圍和程度也可能不會這麼的大。

所以難怪美國時代周刊不僅將其視為一九八七年的「年度風雲人物」，而且更將其推舉為該雜誌的「八十年代風雲人物」(Man of the Decade for the 1980s)，認為他是世局變化的守護人 (the patron of change)，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領航

註④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 Tu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1972, p. 118. 及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二輯，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一九七四年，頁二四一。

註⑤ Seyon Brown, "Explain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XLVI, No. 2, Spring, 1991, p. 216.

員 (a global navigator)。^⑥當然，戈巴契夫獲得一九九〇年諾貝爾和平獎這個事實也可證明世人對其在這次世界變局中所扮演角色的肯定。^⑦

戈巴契夫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固然不應加以忽視，但是更進一步的分析則會引起人們的思考，這其中應該還有其他更複雜的原因，才會導致世界局勢發生這種根本性的變化。比如說，戈巴契夫為什麼要推動蘇聯的改革？對東歐各國採取容忍的寬大政策？這一切只是基於他個人的改革信念、主觀上的認知？或是被客觀事實所迫，而不得不然？或是基於現實政治、經濟原因的考慮？這就又牽涉到事的層面，首先我們可以由美、蘇兩大超級強權勢力的過份膨脹 (imperial overstretch) 這個理論談起。

II、事的影響

美國歷史學者保羅·甘迺迪 (Paul Kennedy) 在其名著強權的興衰 (The Rise &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一書中曾經指出，以前的帝國和現在的強權，都有一種過份擴張其勢力範圍的自然傾向，它們會藉著兼併、結盟、承諾的方式來增加其影響力，鞏固、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但是強權和強權之間又會相互進行競爭，甚或對抗，也會自然防範其他潛在、具有威脅性敵人的興起。^⑧

結果這就會導致帝國勢力的過份膨脹，由於資源的過度分散，及能力的先天侷限性，最後終於到了沒有辦法完全掌握局勢、履行承諾的階段，在這種情況之下，帝國或強權的勢力開始衰退。強權可能由於承諾過多、可能由於備多力分、可能由於政、經資源分配的過份扭曲，於是國力開始減弱，對於盟國的控制、約束、或支持能力也隨之削減、新的挑戰、或權力中心開始逐漸出現，世界局勢開始發生變化。

就以美、蘇兩大超級強權為例，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英、法勢力衰退，德國、日本戰敗，美、蘇兩國成了世界上僅有的超級強權，它們彼此競爭、爭取與國、各自擴張勢力範圍，相互對抗，世界形成東、西兩大集團，冷戰於焉開始，這樣的

註⑥ Time Neusmagazine, (U. S. edition), January 1, 1990, pp. 44-45.

註⑦ 戈巴契夫於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獲選為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在頒辭中指出，「過去幾年間所發生的急速變化已經改變東西方的關係……上述的歷史性變革出自於許多因素，然而諾貝爾委員會希望在一九九〇年表彰戈巴契夫的許多重大貢獻。」「表彰他在已成目前國際社會中相當重要部份的和平過程中所扮演的領導角色」，請參見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十六日，頁三。

紐約時報亦以「本時代的人物」(The Figure of This Era)發表評論，指出光是讓歐洲(意指東歐)能够和平轉變就足以讓其贏得諾貝爾和平獎而當之無愧，戈巴契夫獲獎可謂實至名歸。請參見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17, 1990, p. 8.

註⑧ Seyom Brown, op. cit., pp. 208-210.

局面一直維持了四十多年。

戰後初期，美國藉著圍堵、孤立、及雙邊、或多邊的協防條約，集體安全措施來對抗共產主義的向外擴張。而以共產主義老大哥自居的蘇聯則藉著分化、滲透、代理戰爭、區域性衝突的方式來和美國進行鬥爭，這段期間亞洲地區還發生過韓戰、及台海間的國、共軍事衝突。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美國深陷越戰泥淖，華盛頓方面開始警覺到世界局勢已經有所變化，在尼克森主政時期，他和季辛吉等人尤其認為世界已經由原來的兩極逐漸轉變為多極，除了美國、蘇聯之外，日本、西歐、及中共將成為新的權力伙伴，美國試圖掌握此一時機，引導世局變化的方向。

此時美國的重點工作或主要成就多半仍在外交方面，尼克森終於在一九七二年打開了中共的大門，但是美國內政方面的改革不但乏善可陳，甚至可說是頹象已露，越戰的沈重軍費支出開始拖累美國國內的改革和發展。財政及貿易赤字逐年增加，社會福利、教育、吸毒已經逐漸成了美國社會的重大憂患。

一九八〇年，雷根總統入主白宮，開始大力增加軍費支出，推動星戰計畫，希望以強大的軍事，國防力量來平衡蘇聯的對外擴張行動。雷根並且以所謂的「雷根式經濟」(Reaganomics)，用減稅及增加公共支出的方式來刺激美國國內的經濟發展，但是他這種「巫毒式經濟」(voodoo economics)⑨反而使美國的經濟，及財政赤字更形惡化，某些雷根的經濟事務專家後來也認為，由於武器競賽，龐大的國防支出，導致了巨額的財政和貿易赤字，影響了美國從事內政改革和經濟發展的能力。⑩而這些因素又反過來影響了美國國力的持續發展、擴張，美國開始漸漸由盛而衰。

美國開始要求盟國承擔更多、更大的本身國防需求、協助支付美國駐軍的支出，在這次波斯灣戰爭中，美國更提出責任分攤(burden-sharing)的作法，要求各國分攤軍費支出。在經濟上美國也由自由貿易轉而強調公平貿易，動輒祭出三〇一條款，威嚇其他國家滿足美國的要求。這些事實都說明了時代在變，美國也在調整其本身的政策，美國不再是主宰自由世界的唯一力量，五十年代那種唯我獨大的日子已經成為過去。

同樣地，蘇聯也面臨同樣的困擾，經過了四十年和美國持續、長期性的對抗之後，蘇聯本身的政治和經濟情勢也是百病叢生(當然這其中也有共產主義的制度性因素使然)。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上台以後，他明確的認為蘇聯本身的開放、重建是第一要務，冷戰是其推動上述政策的一大障礙，蘇聯經濟停滯不前，因武器競賽而導致的龐大國防支出必須予以刪減，唯

註⑨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間，喬治·布希和雷根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布希曾以此「巫毒式經濟」來挖苦雷根的經濟政策。但是後來布希在角逐失敗之後，反而成為雷根的就選伙伴，擔任了雷根政府的副總統職務。

註⑩ 同註⑧，頁二一〇。

有如此，蘇聯才有餘力和可能來重建其蕭條、缺乏效率的經濟，推動政治改革。^⑪

蘇聯在自顧不暇之餘，於是開始大幅縮減對東歐國家，以及北韓、古巴、越南這些附庸國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這些國家在宗主國的控制放鬆、經濟支援減少之後，被迫於淒風苦雨之中，紛紛自求生路，也開始摸索，走上改革的道路。

換而言之，蘇聯本身也因為過去四十年的擴張、對抗而受到負面的影響，由盛而衰，所以它也不只是有主觀的意願，而是更有客觀的需要，必須改弦易轍，和美國由對抗轉為合作，減少對外的政治承諾、軍事干預、經濟支援，以致力於國內的改革和發展。

美、蘇兩大超級強權可能由於過度擴張的結果，使得權力過份的分散，資源（包括有形和無形的政治、經濟資源）過份損耗，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控制能力相對的減弱。但在此同一時期，西歐及日本在美國的核子防護之下，國防支出相對較為輕微（尤以日本為然），致力於本身的經濟發展，再加上本身制度的優越性（指相對於共產主義而言），科學、工業水平、教育水準、和外環境的配合，如日本受惠於韓戰、越戰、及本身社會的同質性（homogeneous），所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後，西歐、日本已經隱然成為世界上另外的重要政治、經濟中心，雖然它們仍無絕對的力量能和美、蘇勢力抗衡，但是已能在許多國際事務上扮演較具份量的制衡角色，能够，或至少要求對世界事務能有更大的參與和發言權。

III、經濟性的原因

另外，美國學者杭特（Robert Hunter）則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明這次世界局勢的變動，他強調冷戰的結束有其特殊的歷史和條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政治發生劇烈的變動，美國與蘇聯維持了相當長時期的競爭，而經濟性的競爭則發生了決定性的作用，西方則是這場競賽中的最後贏家。^⑫

杭特的這種看法可能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尤其是美國學者的觀點，他們認為東歐、蘇聯的巨變，以及柏林圍牆的拆除、東、西德的統一是一長時間醞釀的結果（the collapse was long in the making），^⑬而追根究柢的檢討起來，其中還可以找到技術上的根本性原因（technological origin）^⑭

註⑪ 同註⑧，頁二一六—二一七。

註⑫ Robert Hunter, 「新世界秩序」研討會紀要，美國月刊，台北，六卷，九期，民國八十年九月，頁一二四。

註⑬ Jan Prysbyla, "The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A Challenge for Taiwan"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OC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held in Taipei on August 21~23, p. 2.

註⑭ *Ibid.*, p. 17.

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除了一種意識形態之外，基本上也可以說是一種政治經濟組織，但是由於它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烈排他性，以及政治制度上的極權特性，結果使得社會主義及其制度相形之下顯得相當的僵化，缺乏結構性自行調整、變化、成長的功能（structural change, flexibility & growth），而這種制度性自我調整的功能正是諾貝爾獎得主庫茲奈斯（Kuznets）在現代成長新紀元（*Epoch of Modern Growth*）一書中所極力推崇的一個觀念，^⑮資本主義制度的調整及應變能力正是其成功之處。

正是因為缺乏結構性自我調整、成長的功能，社會主義無法適應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科技的發展、新觀念的引入。當整個自由世界，尤其是美國、西歐、日本、及某些發展中國家，如亞洲四小龍，正在極力從事經濟發展，引進新的管理知識，開發新的科學技術的時候，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則對內受困於內部的權力鬥爭，對外則閉關自守、自成一個封閉性的集團和權力體系。由此觀之，社會主義的覆亡已是必然無法避免，結果只是時間遲早罷了。

耶魯大學華裔教授費景漢基本上也同意這個觀點，但他進一步由第二次工業革命（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50-1973）的觀點來說明這次世局變化的原因。^⑯從歷史的長遠發展過程來看，第二次工業革命可以說是二百多年前英國所發生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重現，再度促成人類經濟的大幅成長，人們以創造性的態度，無窮盡的探索，開發科學、技術，並且把由歸納、演繹而來的理論推展到了極致，把理論上的知識又進一步運用在實際的工業生產上面。要參與、掌握第二次工業革命，享受發展的成果，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有關各國就必須有一個靈活、能夠適時應變、調整的政、經體制。在政治上，它必須是實行非專制的民主政治制度。在經濟上，它必須是採取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經濟，鼓勵適度的競爭，發揮人們的主動、積極性，而這正是共產主義所最缺乏的東西。

以台灣的經濟發展為例，台灣正好趕上，而且掌握了這次由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三年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政治上的適度開明，經濟上的自由市場制度，以及政府政策上的靈活調整、適應，結果把台灣成功的由一個缺乏自然資源的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基本上已經工業化的地區。由早期的自力更生，內銷為主、外銷為輔，到後來的外銷導向發展策略，大幅引進西方的資金、技術，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台灣更逐漸進入技術、資本密集的發展階段，即將進入已發展國家之林。

相對於台灣的成功經驗，以及西方的長期、持續性經濟成長，所有的共產陣營國家（自然也包括中共在內）都面臨經濟上的停滯，以及政治上的動盪。共產世界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政治上的需要，選擇了和西方相反的發展模式、僵硬的中央計畫式經濟，以及龐大的國營企業，使得經濟生產毫無彈性，斲喪了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再加上制度上的缺乏適應性，使得共產陣營國家未能把握這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契機，充分利用現代的科技文明，結果在這次關鍵性的長期競賽之中，由漸

註⑮ 請參閱費景漢教授對 Jon Prybyla 文章的評論內容，同註⑭，頁十八。

註⑯ *Ibid.*, p. 18.

趨下風、逐漸落後，終於演變成遭到挫敗，為世界潮流所淘汰。

所以若說這次世界局勢的巨變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有其技術上的根本性原因，是西方的勝利，至少就目前看來，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若借用費景漢教授的話來說就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在十八世紀末期結束了農業主義，第二次工業革命則對二十世紀末期共產主義的衰亡有所貢獻」，^⑭共產主義的崩潰，蘇聯、東歐的巨變，造成了世界局勢的變化。

IV、時機成熟 (The Geist whose Zeit has come)

前面我們已由人（群眾力量、戈巴契夫）、事（美、蘇勢力的過份膨脹，經濟上的衰退，第二次工業革命）等角度嘗試說明這次世局變化的部份原因，下面還可以由時機成熟這個觀點來加以說明。美國麻省賽州布蘭帝斯大學 (Brandeis University) 政治系主任布朗教授 (Seyom Brown) 就提出此一觀點^⑮，他也認為儘管前述的各式各樣的理由，宏觀或微觀的分析方式都能部份說明冷戰結束、世局急速轉變、進入後冷戰時期的這個事實，但是大家也不應忽略某些變化（至少是東歐某些國家）是來自反對派，或政治異議人士壓力的這個事實。

試以波蘭為例，以華勒沙為首的團結工聯，獲得民意的廣泛支持，持續性的對波蘭政府施加壓力，再加上國際上的制裁，終於迫使由賈魯塞斯基將軍所領導的波共政權逐漸走上改革之路。捷克的哈維爾又是另一個例子。東歐國家的許多知識份子，異議人士、藝術工作者，以及青年團體結合起來，形成一股力量，由下而上 (forces from below) 的推動了改革和變化。

這和前面所提過的群眾力量頗有類似之處，用布朗教授的話來說，時代的精神是不能加以圍堵的，^⑯儘管蘇聯和其他的共黨國家都曾用所謂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來淨化社會，用鐵幕來圍堵外界（西方）的政治影響，但是時代的脈動終究是不能長久圍堵、隔絕的，用共產黨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歷史潮流不可抗拒。

當西方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制度，經過時間的考驗，證實優於僵化的共產主義中央計畫經濟，當西方的民主政治被普遍認為是人類已知的較好的一種政治制度之後，一種新的價值標準已經形成，戰後四十多年就是這個標準形成的一個過程，世局經過了相當時間的醞釀、成形，當能量逐漸蓄積到了臨界點的時候，就引發了世局的變化，這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註⑭ Ibid., p. 18.

註⑮ 同註⑤ - pp. 214~215.

註⑯ The spirits of the times, or Zeitgeist, simply could not be contained. 同註⑤ - 頁二一四。

由這個觀點看來，當前世局的巨變確實是過去四十年來日積月累的結果，是時機成熟的必然現象。如果同樣的由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發現中共擔心所謂的西方「和平演變」的「陰謀」也並不是全然杞人憂天、無的放矢的，誰又知道中共目前不是處在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之中？當能量累積到了一定的程度，人民的不滿不能再強行壓抑的時候，誰又知道中共不會發生另一波的巨大變化？

當然，我們也可以質疑這個時機成熟的觀點，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抗已經有四十多年，為什麼世界局勢的巨變早不發生，晚不發生，而正好發生在現在，而且會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內，發生這種根本性的變化？難道真的是因為概念的形成，經驗、知識的累積、能量的聚合需要這麼長的時間？為什麼不會短些？難道由概念化為行動的過程真的得到一九八九年才開始發生作用？然後才一發不可收拾？對於這個問題可能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提供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V、所有上述原因交互作用的結果

由此我們或者可以再引申出最後一個看法，那就是這次世局變化的原因其實是以上所有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任何單一的原因可能都無法促成這次世界局勢的重大變化，如果只有戈巴契夫的遠見，而無其他政、經環境的配合，戈巴契夫可能遭人推翻，改革挫敗。如果只是帝國權力過份膨脹，而無領袖人物的認知及改革，這種帝國衰亡的過程可能還得延長，可能會延緩這次世局的變化。

同樣地，如果沒有群眾的覺醒和參與，而只有領袖人物的急劇改革，這些興革措施可能因為不孚人望而無法成功。如果沒有經濟上的發展，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共產陣營可能不會認識到本身的失敗，也就無從推動其改革政策。

簡而言之，這次世局的巨變可能是前述各種原因交互作用的結果，任何單一的因素都無法成事，由於無法使用量化的方式，我們很難正確的評估，究竟那項因素扮演的份量較重，那些因素的影響較輕，或是某項因素佔有多大的百分比。我們比較能夠確定的是，這次世局的變化是過去四十年特殊的時、空環境，主、客觀條件發展成熟的結果，世局經過了長時間的醞釀，累積了相當龐大的能量，在適當的時機，適當的環境，以及適當的人的多方因素配合之下，所有因素聚合起來，才引發了這麼大規模的局勢變化。

肆、結語

基於我們對於冷戰起源、發展、結束的認知，和對國際政治本質的了解，我們知道變化和穩定可以發生在任何時刻、任

何階層，可以由下而上，也可以由上而下，領袖精英人物、和群眾、異議份子各有其發揮影響力的空間。意識型態、文化、宗族、宗教信仰、甚至自然的生存環境都會影響人們的思維、生活、價值判斷，而這些抽象或具體的因素又會倒過來影響人們的政治行為和制度。

不同的政治行為和制度，或次級制度 (subsystem) 構成了世局的網絡，彼此交互作用，可以相互發生水平，或垂直的影響。每個制度各有其獨特的性質，它一方面試圖擴展其影響力，另一方面則儘量減少其他制度對本身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資訊流通的速度加快，以及人的異動 (mobility) 增加，制度和制度之間更加的具有相互依賴性 (interdependence)，和互相滲透性 (interpenetrability)，結果優越的制度逐漸趨於上風，日積月累的結果，終於造成了世局的變化。

把這些理論上的介紹轉化為實際的說明，作者在認識到微觀的個別性因素也對世局變化具有影響力之餘，嘗試以宏觀的方法，由人的因素，時間的觀點，和事務的影響這個層面來解釋這次世界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的主要原因。文章中提到了戈巴契夫所扮演的重要、關鍵性角色，群眾可能發揮的影響力，美、蘇兩大超級強權勢力的過度膨脹，經濟因素，及二次工業革命所造成的結果，以及時機成熟這些因素。作者個人相信儘管每個單一的因素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沒有其他時、空環境，及主、客觀因素的配合，任何一個單一性的因素都無能力使整個局面在一九八九年以後短短的三年之內，發生這麼大程度、影響這麼深遠的變化。

對於某些人來說，這個結論似乎顯得太過平淡無奇，了無新意，但是正如著名國際關係理論學者羅森納 (James Rosenau) 在其巨著國際政治的動盪：變與不變的理論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一書中所強調的，要了解國際政治的變與不變，必須配合微觀性的認知，用宏觀的方法對整個國際制度，及次級制度有所了解，並且要藉此對世局的變化和動盪加以評估。^②他特別指出，一個複雜的國際制度和局勢，其中包括了整體和個體，人們只有靠著一種敏銳的觀察力，在制度、次級制度、整體、和個體之間，用宏觀、微觀的方法在其間游移，來回檢視，交互印證，這才能使大家對於事情的真相有一個較清晰、準確的了解。如果只是一味的堅持一個簡潔、單純的分析方式，那麼我們不僅不能了解現實世界變化的原因，甚至還可能對未來世界局勢的發展產生錯誤的判斷。^③此話深值吾人深思。

^② James N. Rosenau,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9. See also Seyom Brown, op.

cit. pp. 218~219.

^③ Ibid.